

叙事的嬗变与转型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研究

周景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叙事的嬗变与转型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研究

周景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的嬗变与转型：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研究/周景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162 - 2

I. ①叙…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340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21 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量”点掠影 / 1

上编 观念的流转

第一章 叙述的限制与文化内质 / 13

第一节 叙述的转型与日常的叙事 / 13

一 从时间政治看文学转型 / 14

二 从小说创作看文学转型 / 17

第二节 长篇的难度与精神的力度 / 22

一 文学的文化假晶现象 / 23

二 对原质文化的还原 / 25

第二章 历史的立体建构与多维空间 / 29

第一节 多元复合的历史趋向 / 29

一 历史叙事向多元复合发展 / 30

二 历史的大小写 / 32

三 历史的主客观 / 34

四 由同质性转向个体性 / 37

第二节 历史主体的突围实践 / 38

一 小人物对历史的承担 / 40

二 历史道德的超越 / 44

三 每个人对历史都负有责任 / 46

第三章 代际差异背景下的叙事景观 / 48

第一节 代际、境遇与叙事想象 / 48

- 一 不同记忆的审美差异 / 49
- 二 这代人用时间来表现真实 / 50
- 三 这代人也喜欢宏大叙事 / 57
- 四 那代人更愿意描写日常生活 / 60

第二节 认知差异与应对姿态 / 64

- 一 关注人民、关注生命 / 64
- 二 有度量地自我承担 / 69

第三节 异质的审美传达 / 73

- 一 饱满厚重的叙事风格 / 73
- 二 轻盈灵动的艺术追求 / 78

第四章 英雄主义的重新召唤 / 83

第一节 思想、传奇及其品质 / 83

- 一 英雄主义的两种路径 / 83
- 二 有一种不变的品质 / 91

第二节 启蒙与世俗的合作共进 / 95

- 一 启蒙的英雄主义 / 95
- 二 在世俗中发现英雄 / 98

第五章 新伤痕主义的成长方式 / 103

第一节 伤痕的表象与隐秘的情结 / 103

- 一 虚化的叙述背景 / 104
- 二 用偷窥和告密介入历史 / 107

第二节 成长的伤痛与质疑中的承担 / 110

- 一 既要承担也要质疑 / 110
- 二 疼痛中的亲情关怀 / 114

下编 空间的再生

第六章 乡土世界的深度裂变 / 121

第一节 第三种空间里的新困境 / 121

- 一 把遭际放进新的空间 / 122
- 二 新空间里的紧张关系 / 123
- 第二节 在批判中向传统和正义回归 / 129
 - 一 乡土叙事的两种走向 / 129
 - 二 史诗与正义的回归 / 130

第七章 工业生活的深度植入与难度 / 138

- 第一节 题材的终结与生活的难度 / 138
 - 一 从题材到生活 / 139
 - 二 关键要有工业精神 / 141
- 第二节 类型化写作与实践性反思 / 143
 - 一 工业生活写作的三个类型 / 144
 - 二 文学性与社会性都要考虑 / 149

第八章 民族身份的超越与文化救赎 / 155

- 第一节 文化寻思与主体性超越 / 155
 - 一 要关注现代化这件事 / 156
 - 二 大跨度地书写民族史 / 157
 - 三 超越族群主体性 / 159
 - 四 穿过文化的幕帷 / 163
- 第二节 现代性的质疑与救赎 / 167
 - 一 它们破坏了精神生活 / 167
 - 二 一种“复魅”的努力 / 171

第九章 军垦生活与文化维度 / 174

- 第一节 典型文本与性别观照 / 174
 - 一 他们的写作很独特 / 175
 - 二 性别的境遇与力量 / 183
- 第二节 审美体验与文化特质 / 187
 - 一 富有诗意的边疆书写 / 187
 - 二 凝练和创设一种特殊文化 / 191

第十章 辛亥叙事的传承与新变 / 197

第一节 叙事缘起及其历史轨迹 / 197

一 辛亥叙事简史 / 197

二 另外一种路径 / 203

第二节 叙事转向与观念重构 / 206

一 传奇特质的新变 / 207

二 苦难的两个层面 / 209

三 非虚构的品质及表现 / 211

四 从家族文化到民族精神 / 215

五 最重要的是思想价值 / 217

附录 对谈与访谈

附录一 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

——新世纪文学反思录 / 223

附录二 写作就是对现实的回应 / 233

附录三 从生存的大地到信仰的天空 / 251

附录四 文学要给人以力量 / 265

参考文献 / 278

绪论 21 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 “量”点掠影

21 世纪^①前十年长篇小说的高度发达已经有目共睹，在不同目的驱动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已形成风潮，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很难对之作出整体性的准确评价。按照白烨先生的“传统纯文学”“大众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三分天下的说法，我们限定在对传统型长篇小说的创作考察上，并选取了数量、质量、体量和容量等观测点作具体探讨。

数量是我们对新世纪十年长篇小说进行整体研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从气势上讲，十年来，庞大的长篇小说数量已经使读者和研究者感到“呼吸困难”，但也使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更深沉、更美好的期望。我们知道，在一个文化多元和众声喧哗的时代，仅凭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是很难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做出整体性的判断的。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发布 21 世纪十年来中国产出的长篇小说的数量，但通过零散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做出大致的推测。据 2003 年 3 月 21 日的《今晚报》转载《中华读书报》的消息：从 2000 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版长篇小说 700—800 部，到了 2002 年直逼 1000 部。而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 20 年中，长篇小说创作的总量也不过 170 多部。2006 年，《中国图书商报》的一则消息说，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数量激增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白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了大量数据说明长篇小说在数量上的“惊人”发展：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每年 20—30 部，到 90 年代初达到 100 部，90 年代中期达到 700 部，90 年代后期达到 1000 部，现在每年的数量大致稳定在 1000—1100 部之间。^②《人民日报》2010

① 本书以下简称为“新世纪”。

② 白烨：《年度文情报告显示长篇小说危机》，《中国图书商报》2006 年 8 月 8 日。

年4月发布了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现状的报告，报告中说：“2009年，长篇小说依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门类。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9年长篇小说实体书出版达3000余部，相比2008年出现成倍增长。而网络文学长篇小说的数量更为庞大。长篇小说的成就是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①在各种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出版数量的判定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种数量的激增在2005年以后更加明显，有的研究者感慨道：“在2008年，虽然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那么多令人震惊的事端，但这些却并没有能够影响阻止中国的作家们从事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情，在所谓长、中、短篇小说的各种体式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依然是长篇小说。”^②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长篇小说进行年度盘点似乎已经形成了传统，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在数量上给出一个准确的统计。不是说数量的研究对长篇小说的研究意义不大，而是说，如果加上网络长篇，这个数字几乎是无法统计的。由于无法进行这种统计，那么势必就会对年度盘点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对于这一现象，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调侃道：“不知从何时起，批评家们给文坛做年度总结似乎已成风气，而且其势日炽。从前些年的几个人在做，到现在的十几个、几十个人在做。这已经成了很多文学类期刊、报纸的开年大戏。他们大都分体裁总结一年的收获，比如2008年短篇小说扫描、2008年长篇小说盘点、2008年散文收获等，大都谈名家、谈名作。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种具有明确工作总结意识的扫描、盘点、收获却是人言言殊，差别甚大。比如这里有两篇总结2008年短篇小说的文章，里面都列举了一大堆作品，细细读来，发现两者都提到的竟只有两三篇。再顺着这样的线索找来其他的什么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总结文章一读，竟也都各说各话。于是我就疑惑了，实在是不知道如何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来判断中国的年度文坛了。”^③但笼而统之，数量的绝对增加，证明了长篇小说在新世纪的异常繁荣。对于繁荣的原因，有人看到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有人看到了市场的推动，也有人看到了网络的发达等。其实这些都是外在的原因，如果没有文学在这个时代自身的解放，

① 《2009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长篇小说实体书3000部》，《人民日报》2010年4月22日。

② 王春林：《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略论》，《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③ 周景雷：《令人摇头的文坛“年度总结”》，《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3期。

如果没有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文学边界的无限扩大以及它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所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终究是会受到制约的。

在一定层面上来说,这十年确实产生了一些反响较好的作品。那些早在 20 世纪就已名声大振的作家仍然在长篇小说领域支撑着局面,比如贾平凹、莫言、张炜、王安忆、铁凝、阎连科、李洱、格非、苏童、余华、毕飞宇、范小青、阿来等,这些作家的作品,甫一问世,便能吸引批评家的眼球。但在整个十年的创作队伍中,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也许这些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较高成就,但代表不了一个时代的普遍成果和长篇小说的整体风貌。批评界的一个怪现象就是喜欢以偏概全,很多研究文章和年度总结对长篇小说的总体评价不是小心翼翼,而是模棱两可,并在此之下开始了歌功颂德。事实上,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这十年长篇小说的质量就有相应的提升;相反,由于优秀作品不多,相对于庞大的出版数量而言,在质量上似乎出现了某种颇有意味的“倒退”,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即使那些被歌功颂德的作品,在整个十年的历时阶段中,有多少能够占据稳固的经典地位,既能经得起读者的检验,又能经得起历史的淘洗?比如,从 1999 年至 2008 年,共评出两届茅盾文学奖,九部长篇获奖。这其中除了两三部可圈可点之外,大多数将会零落风尘。而这些相对于这些年近万部长篇来说,肯定是“质”高一筹。假如以此来计算长篇小说的优秀率,如果能够计算优秀率的话,其结果将会十分尴尬。为此,学者肖鹰曾建议“茅奖”评选暂停十年。他认为,最近十年中国文学“无论是叙事、题材,还是格调,都在走下坡路,严肃文学极度萎缩”^①。虽然笔者个人不完全赞成这种极端说法,但他确实道出了中国长篇小说最近十年的某些基本事实。当然,即使整体质量不高,也不能将个别上乘之作一票否决。

在笔者看来,简单地说,最近十年长篇小说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文学性,艺术品相破损严重,这包括语言表达、讲故事方式,甚至审美取向,有很多作品走向了粗鄙,很多关于民间、都市以及底层的理论、概念和材料被写作者滥用;二是文学功能相对单一或者发生转

^① 200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0 年 6 月 12 日,《辽宁日报》历时半年,成功推出了“重估当代文学价值”大型讨论,国内外 60 余位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参与了此次活动。其中,肖鹰和陈晓明分别代表了“垃圾说”和“高度说”两种倾向。参见丁宗皓主编《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

移，整体格调不高，思想力不足，作品张力整体较小，缺乏阐释和向经典过渡的可能；三是为追求数量和速度，很多作家不断进行自我复制或者相互复制，模式化、雷同化倾向严重，甚至出现了流水线、创作工厂等现象。

与数量剧增相伴随的是最近十年长篇小说体量的扩大。体量之说，其实就是小说的文字长度，这本不是个问题。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当小说成为文学的正宗或主体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大跨度、大体量的作品问世。比如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及李劫人的长河小说等。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也并不少见，比如：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三部曲，起笔于1957年，收笔于1985年；梁斌的《红旗谱》三卷本，起笔于1953年，完成于1983年；类似的还有姚雪垠的《李自成》、浩然的多卷本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较大，有的长达30年才完成，而且在一个作品贫乏、思想苍白的时代都产生过较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写作路向也长盛不衰，充分反映了中国作家内心深处一刻也不曾改变的史诗情结。但是这种历史是如何被把握的，反映了一种怎样的作者个人的或者国家的历史观都是值得深刻反思和检讨的。

新世纪长篇小说体量的扩大首先表现在字数上，动辄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随处可见。比如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张翎的《金山》、格非的《人面桃花》、阎连科的《风雅颂》等。莫言用43天的时间创作出了40多万字的《生死疲劳》，每天以1万字的速度前行，引来了很多惊异和对速度与质量之间关系的质疑。贾平凹的《秦腔》长达110万字，作品中，细密的日常生活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凝滞了琐碎、嘈杂和“泼烦”的日子，以致一些专业读者读之都感觉喘不过气来。在笔者个人的阅读中，20万字左右的长篇亦属短篇了。

多卷本或三部曲式的创作也是最近十年长篇小说领域的一大收获，而且大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的甚至成为优秀之作。张洁的《无字》是三卷本长篇，小说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一家三代女人的爱情与婚姻，表现了在一个动荡不安、跌宕起伏、政治与生活相互交织的大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苦难，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苦难书写又一高峰，该作品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初版共分上、中、下三卷，110多万字。小说以一个名叫“天门口”

的小镇为中心，通过雪、杭两个家族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历史进程中的政治与情感纠葛，展现了国家与个人、思想与主义、斗争与改良等主题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纠缠与演变。整部小说阔达开朗、意味深长，因此有人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是一部涵纳融汇了‘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艺术优势，然而同时却又突出地体现着刘醒龙巨大创造性的历史小说的集大成之作。”^① 这部作品虽然与茅盾文学奖无缘，但却获得了首届当代文学学院奖。阿来六卷本的《空山》是其继《尘埃落定》之后的力作。小说以“机村的传说”为副题，用《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五卷，从不同的侧面呈现了机村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用第六卷《空山》作总结，表达了一种对空洞的没有精神内涵的现代性世界的失望。类似的多卷本或者三部曲的作品还有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天地月亮地》《黑蚂蚁蓝眼睛》《无土时代》），这是一部跨世纪的写作，前后历经23年）、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为完成此作，范稳先后在藏区游历了十多万公里，学会了用“藏族人的眼光”看雪山、森林、草原、湖泊和天空中的神灵）、杨志军的《藏獒》、麦家的《风语》、肖仁福的《仕途》、宗璞的“三记”（《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余华的《兄弟》、格非的《人面桃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而多卷本的网络文学《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更是创造了体量、出版和阅读的神话。在这十年当中，最有影响的大体量创作要数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十卷本450万字的《你在高原》。作者张炜在此部著作中融入了自己对世界的全部思考，被誉为“大地之书”、“行走之书”和“心灵之书”。该著作能够获奖，笔者认为，除了其作为一个精神标高之外，其苦劳与勤劳也是评委们用心考虑的因素。

但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是，正如我们在讨论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那样，大体量的创作和质量未必就成正比。即便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作品获得了市场的份额，获得了批评家的青睐，但未必就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时间的剥蚀。很多作家在出版这些作品时，经常被誉为“十年磨一剑”，或者二十年、三十年的酝酿，但即使酝酿终生，也未必就能使最终

① 王春林：《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小说评论》2005年第6期。

呈现的文本与所酝酿的过程成正比。如果作家只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就能写出好作品，恐怕每一个人都能写出鸿篇巨制。因为每一个人，不管是否立志要成为作家，对于他的个人经历和对社会的思考而言，终生都是在内心当中进行着潜文本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能够成为经典之作，不独依靠作品的字数，不独依靠写作的时长，也不独依靠如何酝酿，关键还在于写作者的表现能力、思想能力和艺术能力。是什么支撑了大体量的写作？这是我们必须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关于容量问题应该是最近十年长篇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容量包含了生活的广泛性和生活的延展性。文学上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一直习惯的“题材”。笔者曾主张用“生活”来代替“题材”，因为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题材”观念正在终结，而生活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是众多领域和生存属性的综合。它不仅淡化了原有题材观念中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弥合题材和题材之间的裂痕和虚空，这使作家能够从生存整体性原则出发来构思自己的创作，进而表现生活的本质。同时，它又使文学充满活力，因为只有人才能构成生活的主体，于是人也就成了文学的主体。它的意义还在于，当我们把题材转化为生活的时候，还会发现，和题材的命名比较起来，生活才是圆阔的、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它不是题材式的线条，而是生存性的空间，其本身是具有审美意义的”^①。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我们以此来审视新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便会发现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密切，同时文学所承担的生活的任务也从来没有这样轻松。

就生活的广泛性而言，乡村生活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当下长篇创作的半壁江山，这既是传统的进一步流转，也是现实让作家承担了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秩序、伦理以及想象的改变。于是在这一生活领域出现了坚守与离弃的双重变奏。《秦腔》《天高地厚》《刺猬歌》《受活》《湖光山色》《村子》《农民帝国》《末代紧皮手》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底层写作”的充分实践和理论跟进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双重变奏注入了更多的悲壮色彩，尤其是曹征路的《问苍茫》的加入，使“新左翼文学”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工业生活的长篇小说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寂寞之后，

① 周景雷：《题材的终结与生活的难度》，《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再度在这个十年潜出水面,《机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苦楝树》《月亮上的篝火》《长门芳草》《遍地黄金》《飞狐》《湿润的上海》等,虽然这些长篇的艺术成就有待商榷,但它们至少呈现了“泛工业化”时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亮剑》《历史的天空》《暗算》等军事或者类军事生活的长篇小说集传奇与神秘于一体,从世俗的正义原则出发,并借助影视的力量,几乎成为这个十年最吸引眼球的创作。在这类作品中,《我是我的神》凭借着其自身所独有的思想内涵而独树一帜。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这十年当中仍然是十分尴尬的,从《沧浪之水》到《风雅颂》,再到各类“大学门”“教授门”,知识分子在长篇小说中的地位每况愈下,集体成为新世纪的“庄之蝶”。在这十年中,都市生活与官场生活紧紧缠绕在一起,都市的五光十色与官场的尔虞我诈和贪污腐败最大限度地铺展了现代化生活中权力与欲望对人的侵蚀。对历史的回望以及对历史中间物的生存审视仍然是中国作家最原始的和最深刻的写作冲动。新世纪的历史写作更多地集中在对 20 世纪革命史的反思和重构,比如《人面桃花》《花腔》《坚硬如水》《圣天门口》《生死疲劳》《蛙》《英格力士》《兄弟》《河岸》《后悔录》《第九个寡妇》《衣钵》《一九四八》《赤脚医生万泉和》《笨花》《启蒙时代》等,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可与乡村生活的写作相媲美。这些作品或写土改,或写“大跃进”,或写“文化大革命”,或写 1949 年以前的革命,都表现出了一种与此前的革命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和精神品格。对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书写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十年长篇小说的容量,比如《空山》《格萨尔王》《蒙古往事》《石羊里的西夏》《长调》《康巴方式》《紫青稞》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汉族作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傅查新昌的《秦尼巴克》等作品,不仅对现代化进行了某种反思,而且还能超越族群(汉族)主体意识,从而获得具有普遍特征的个人主体性;特别是,尽管饱受争议,杨志军(《藏獒》)和姜戎(《狼图腾》)不仅以汉族作家的身份进入少数民族文化书写当中,而且还因为他们的作品对动物的独特书写成为新世纪生态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上述举隅仅仅是按照传统逻辑所进行的某种提炼,这些生活领域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写作中到底占有多大的份额是很难遽下决断的。生活正在化身为细密的尘沙,随风潜入所有的文学创作当中。

新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的容量还表现在对时间的大跨度把握上。任何一种生活都是由空间和时间组成的，生活的流动会不断地构筑新的空间与时间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合理地使用和调整这种关系，能显示出作家对深度和广度的不同注意力。比如贾平凹的《秦腔》，由于他十分在意用琐碎的日常生活来反映当下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变化，因此他的注意力就在于他对日常生活原生态式的深度描摹上。110万字的日常生活描写呈现了一个乡村秩序和结构“渐变”的过程，但一年的时间跨度却又明显提示我们这个“渐变”同时也是“剧变”。同样是表达这一主题的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则表现了二十余年的跨度，冯积岐的《村子》的时间跨度甚至更长。与《秦腔》相比，这两部作品更看重的是中国乡村变化的广度。再如，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讲述了一代年轻人如何在一种理想主义和政治激情激发下的“茁壮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都在一种政治关系的引导下受到考验。小说的时间跨度为三年，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其实是不长的。不过，唯其短暂，才显示出特殊年代的少年快速成长的尖锐性；同样是表现成长的疼痛和蜕变，苏童的《河岸》的时间跨度是十几年，东西的《后悔录》的时间跨度是几十年，而艾伟的《风和日丽》甚至更长，这种大跨度的描写也许就会起到用时间的延伸来抹平“剧变”的疼痛的作用。

从创作实践上看，整体来说，新世纪传统型长篇小说的作者们似乎更愿意用大跨度的时间来表现更为广阔的生活。在上文所列的长篇小说中，除了《秦腔》《启蒙时代》《山河入梦》《紫青稞》《一九四八》等少数作品外，大都把时间做了尽可能的延伸。少则十年八年，多则二三十年，有的达到了五十年、七十年、九十年，而像范稳的《水乳大地》则描绘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关于此点，不再一一列举。

以时间长短来考量或者扩大作品的容量，已经成为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常态，这不仅源于中国作家始终不能放弃的“史诗性”^①的写作冲动，也更源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这个事实就是

① 关于“史诗性”问题，吴义勤认为中国作家的“史诗性”追求是与黑格尔所总结的“史诗”背道而驰的，他认为：“我们一直推崇史诗，甚至把史诗神化成了判定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并不理解‘史诗’的真正内涵。”参见吴义勤《难度 长度 速度 限度》，《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中国的百年史是丰富、复杂、曲折、多变和富有张力与弹性的，既有神秘宿命色彩，也有历史正义与自身规律。这为作家想象力的延展提供了空间，并为对某一历史时段的一再书写提供可能。由于观念的变化和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价值取向的差异，加之现时文化和价值的多元，作家们能够有效地对历史进行新的检讨和反思，并将之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恪尽知识分子的职守。所以，莫言通过《生死疲劳》对土改运动的反思、通过《蛙》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范小青通过《赤脚医生万泉和》对赤脚医生制度的反思，李洱通过《花腔》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的反思等等，不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才能充分实现，而且也只有价值多元和开放的时代才能实现。可以说，在新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创作中，时间容量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着历史观的“扩大”。

其实，对新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的总体把握可以选择数个观测点，“量”点仅是其中之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在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观察新世纪前十年当代长篇小说在创作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审美标准、叙事方式的变化，更包括创作主题和创作领域的变化。全书共分两编十章，每编各五章。在上编中主要探讨了新世纪十年来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观念的传承与变化，主要包括日常生活转向问题、英雄主义问题、作家的代际问题、历史观念问题等。要说明的是，关于代际问题，本书只选取了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作家和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进行了比较，而最近十年在文坛上更加具有轰动影响的 80 后作家代际问题并没有提及，主要原因在于，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一代作家在整体的文学诉求上有相当多的共性，但其创作本身，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还不是很高，故没有纳入进来。网络文学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没有被考虑。在本编中，笔者还提出了一个“新伤痕主义”问题，并以此来概括 60 后作家的创作新变。本书的下编主要是从题材或者生活的角度来探讨长篇小说的世纪新变。这些领域既有对一直在长篇小说领域占有主流地位的乡土题材、工业题材的探讨，但其实笔者更注重的还是少数民族题材、军垦题材和辛亥叙事的内容。做这样一个选择主要是基于两个认识：一个是变化明显的；另一个是新出现的。中国最近十余年的社会转型和变化非常明显和深刻地体现在乡村社会、工业社会和都市生活中，这不仅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的想象，同时还为文学的边界、文学内涵以及文学的表现方式等方面带来了挑战，这一时期的乡土题材、工业生活类的长篇小说正是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的回应；

同时，我们还能检视到其他题材领域的回应。至于少数民族题材、军垦题材和辛亥革命题材，虽然在当代文学甚至现代文学一直以来有着较好的叙事传统，但在笔者看来，从来没有像最近十多年来这样得到重视，有时甚至令人感觉是突然之间的爆发。这不仅反映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在文化选择上的多元性，其实也更多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生态的变化。当然，一些有着突出的创作表现的题材也没有被考虑，比如学院知识分子题材就是这样。在最近十年中，有关叙写学院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也曾繁荣，代表性作品有《所谓教授》《大学纪事》《大学轶事》《学腐》《教授》《桃李》《沙床》等，这些作品虽然在很深刻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和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但在笔者个人看来其价值还有待商榷。另有一些没有关注到的，期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予以弥补。本书在附录部分列了四篇文章，也是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成果。其中一篇是与学者的对谈，其余三篇是对作家的访谈。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相关内容中，经常使用“叙事”或“长篇叙事”这一术语。这是在文学分类意义上的使用，比如叙事文学、抒情文学等，在本书中特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而非指叙事学中的“叙事”。

本书各章是各自独立的，但研究立场和方法却是一致的。现在把这些成果呈现在大家面前，敬请批评指正。